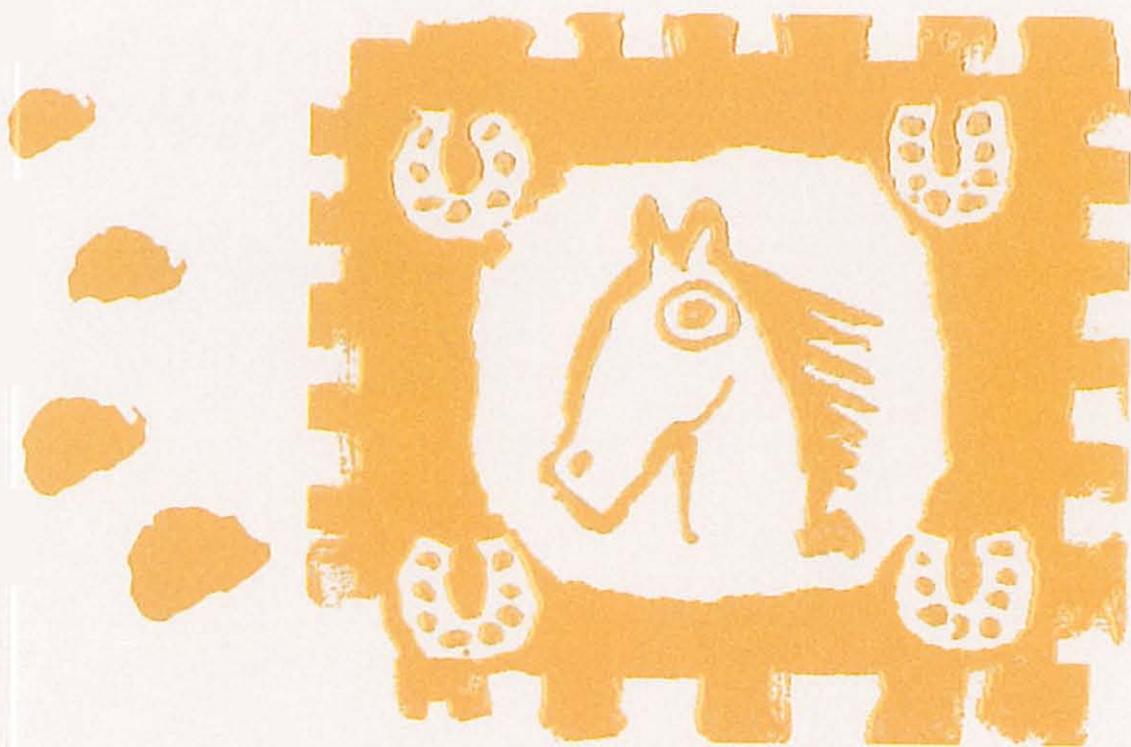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 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马邑文化三论

李元庆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邑文化三论 / 李元庆著 / 三晋出版社 . 2011. 10

（马邑文化系列丛书 主编：郭连厚，刘彪 执行主编：熊国章）

ISBN：9787545704303

定 价：19.80 元

内容推荐

今朔州市市委、市府所在地——朔城区，古称马邑。据朔州旧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大将蒙恬率秦军北击匈奴，在此筑城养马，故名马邑，因之名县，马邑之名始此。

引言

马邑是今朔州古称，历史上曾有过马邑县、马邑郡建置，本文即以古老的马邑作为今朔州的总称谓。

朔州是北魏建置的行政区域，初称怀朔镇，为道武帝、太武帝所建“六镇之一”，至孝明帝时改称朔州，从此有了“朔州”之称，其地当时在今内蒙古五原一带，即秦的九原郡、汉的五原郡一带。

北齐始以今朔州之地建置朔州，为了与东魏建置于今汾阳、介休一带的南朔州相区别，当时亦称北朔州。这是今朔州之地以“朔州”作为行政区域称谓的历史开端。

马邑作为行政区域的历史要比朔州古老得多。相传秦时即于今朔城区城关桑干河北岸建筑了马邑古城，建置为马邑县。两汉因之，隋唐时还曾于此建置马邑郡，清代还有马邑乡。可见，马邑作为行政区域有着 2000 多年的历史。马邑古城曾一直是马邑县、马邑郡以及古朔州之治所。总之，马邑不但历史悠久，且有着关于马的神奇传说，文化底蕴悠长深厚，故我们即以古老的马邑作为今朔州的总称谓。

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 2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

在 2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马邑地区是北方各民族迭相活动的集中场所，是北方各民族同中原汉民族频繁交往的历史舞台。马邑文化是古代北方游牧文化区的重要基地，是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熔炉。总之，北方各民族同中原汉民族的交往和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构成了“马邑·马邑文化”的主体，自然也是我们讨论“马邑·马邑文化”的主题。

本书即围绕这一主题，分别从中国马文化、中国考古学文化和三晋地域文化等三种视角谈谈马邑文化的独特历史风貌及其发展演进。

简单地说，马文化其实就是骑马民族文化，或者说骑马民族创造的文化；骑马民族也叫马背民族，就是古代北方民族或草原游牧民族，马文化其实就是古代北方民族关于马的文化。

马邑古城便是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产物；马邑文化便是伴随着北方民族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向前推进的。因此，谈马邑文化的历史风貌及其发展，首先需从北方民族关于马的文化亦即中国马文化谈起。

目 录

引 言.....	1
一、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	1
(一) 马文化：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	1
(二) 黑驼山下“猎马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3
二、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	6
(一) 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是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	6
(二) 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汉）民族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	11
三、马邑文化与三晋地域文化.....	14
(一) 马邑文化作为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的理论依据.....	14
(二) 马邑文化作为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的方法论依据.....	17
附 释.....	19

一、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

（一）马文化：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

可以这样说，马文化是凸显北方民族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

关于北方民族文化广阔丰厚的内涵可不必铺陈详叙，这里仅就其最具根本性的几个方面便不难看出马文化的典型标志性意义：

一是以大漠草原为主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是说，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大漠草原，由此形成的以大漠草原为主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之一。

当然，北方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有诸如深山老林、河湖海洋以至丘陵平原等不同类型，由此形成的诸如狩猎文化，渔猎文化以至耕垦文化等，皆属于北方民族生态文化的构成要素；但是，大漠草原是其生存依托的主要生态环境，草原生态环境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草原生态文化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之一。基于此，故一般称北方民族为草原民族，称北方民族文化为草原文化。

二是以游牧放牧为主的民族经济形态。主要依托草原生态环境而生存的北方民族，基本的谋生手段便是游牧放牧，由此形成以游牧放牧为主的民族经济形态。其显著特点即《史记》、《汉书》描述的：“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因而“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晁错传》）。这种飘忽迁徙的游牧型经济是北方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特质基础，亦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又一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基于此，故一般又称北方民族为游牧民族，称北方民族文化为游牧文化。

三是如《史记》、《汉书》所说“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游动型生活方式（《史记·匈奴列传》；《汉书·晁错传》）。衣食生活方式是经济形成的产物。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正是适应游牧放牧的经济形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亦由此构成北方民族文化最具根本性的内涵特质。

四是在草原生态环境、游牧经济形态和游动型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诸如社会风情、婚丧民俗以及宗教信仰、精神意识等等，共同构成北方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

但是，全面考察北方民族文化的总体构成及其形成发展不难发现，草原生态环境，或是

游牧经济形态，或是游动型生活方式，以及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皆离不开“马”这个物质实体，离不开关于马的文化。

草原生态环境是骏马驰骋飞奔和繁衍生息的广阔天地，故“草肥马壮”便成为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依托，从而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由此形成了北方民族特有的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生态文化，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自然生态文化。

游牧经济形态，其实就是马背经济形态，或者说北方民族以马为生产工具，通过骏马狩猎获取物质财富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形态其实主要是在马背上形成的，或者说以马背生产手段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北方民族的游牧经济形态，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经济形态，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社会经济形态。

游动型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马背生活方式，或者说与北方民族游牧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是在游牧经济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在骑马狩猎，“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因射猎禽兽为生业”的生产手段制约下形成的“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衣食之业不著于地”的物质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北方民族的游动型生活方式，其实即是关于马的生活方式，即是马背生活方式，或者说以马文化为典型标志的物质生活方式。

至于北方民族的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作为游牧经济形态和游动型生活方式的历史映现，同样贯穿着马这个物质实体，是伴随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总之，马文化是凸显北方民族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

中国古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物质生活方式以及社情民俗、精神意识等等，总体上区分为平原丘陵农耕型和大漠草原游牧型两大基本类型，深山老林狩猎与河湖海洋捕猎可归属游牧型范畴；由此形成了以中原黄河流域（旱作）和江汉地区（水作）为载体的农耕型文化，以及以“三北”（西北、北方、东北）地带为载体的游牧型文化相与并存的文化发展格局。

农耕型文化其实主要是以牛为生产工具，以牛耕田收获谷物为谋生手段的文化，故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做“牛文化”或农耕民族关于牛的文化；在这种意义上，牛文化亦可以看做是凸显农耕型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了。

这也就是说，作为凸显游牧和农耕两类文化内涵特质的典型标志，马文化与牛文化便可以看做游牧型文化与农耕型文化相区别的典型标志了。

（二）黑驼山下“猎马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马作为野生种群，年代相当久远了；作为“马文化”，是指人类与马发生关系而后形成的文化现象；严格意义上的马文化，指野生马受人类驯化成为家马并为人类服役的历史文化现象；此前可称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

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存中，都还没有家马发现的情况”；“马的驯化和服役，首先是由中亚的原始牧人所完成，然后在文化交流中，逐渐地向东、西方向发展。向西到了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发展至中国，主要分布在中原华夏农业民族文化北部半月形成地区（王克林，《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黄河文化论坛》第2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也就是东起松辽平原，经长城一线，沿内蒙古和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西到宁夏、甘肃、青海与新疆这个半月形的“三北”地带。

这说明，在中国古代，马被驯化并为人类服役的马文化，开始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代。马为人类服役经历了由驮载到挽车，再到骑乘，直到作为征战兵种的骑兵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

据史家考证和考古资料印证，马被用于挽车出现于殷商时期，西周时期由挽车转为骑乘，春秋时期有了作为征战的骑兵兵种，从此，骑兵作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文化发展的主流。

春秋战国时期用作征战的战马主产地，史籍有下述一系列记载：

《左传·昭公四年》谈当时晋国的军事优势说“国险而多马”。就是有险可据，又多战马。马从何来？“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冀即冀州，在今山西、河北以及河南部分地区，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冀之北土，即今山西北部浑源、广灵、阳高与河北蔚县、阳原、怀安一带的代地，这里是战马主产地。

《战国策·赵策一》记述合纵派领袖苏秦为说服赵王放弃伐齐计划而全力对付秦国时曾分析说，假如秦国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雁门山），沿常山（恒山）一线截断赵都邯郸与西北山地的联系，那将会“代马胡驹不东”，使赵失去代地战马的来源，亦说明代地是战马主产地。

《史记·赵世家》记述了赵武灵王20年（前306）推行“胡服骑射”后，“西略胡地……林胡王献马”。林胡当时分布于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说明这一带亦属战马主产地。

总之，今山西北部及其周边地带，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马主产地。所以，顾祖禹《读

史方輿纪要》卷 39《山西一》分析古代山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说，它“表里山河，称为完固”，进可攻，退可守，进退攻守，因势乘便，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又有北部代地的战马，南部河东的池盐，提供了雄厚的战略物资；在此形势下，“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立于不败之地，“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这里也特别强调了北部“代马”的重要战略意义。

山西北部所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马主产地，追根溯源，可追溯至距今 1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阳高许家窑人文化和距今 3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朔州峙峪人文化。

尤其是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属于中国原始马文化的典型形态，从而为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是新石器晚期被人类驯化的家马由中亚传入中国，进而形成中国马文化的直接的内动因和历史渊源。

许家窑人文化遗址位于大同盆地东北桑干河流域阳高县许家窑村的断崖上，其文化面貌的独特个性在于：

一是迄今山西发现人类骨骼化石最多的古文化遗址，故称“许家窑人文化”，“许家窑人”是继“丁村人”之后而闻名于世的山西古人类群体。

二是许家窑人制作的石器工具以细小石器而著称，不仅数量相当大，器形相当多，且工艺相当精致，诸如小型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石球等。其中，各类尖状器最大的重 13 克，最小的仅重 1 克；各类石球最大的超过 1500 克，最小的不足 100 克。小石器工具，主要用于剔剥切割捕获来的动物肌筋骨肉；石球，大多可投掷捕杀野兽，小的可制成远距离捕获猎物而不被猎物伤害的“飞石索”，是当时颇具杀伤力的狩猎武器。

三是大量的动物化石表明，野马、野驴等已是许家窑人捕获食用的重要来源，工艺较精致的小石器和制作“飞石索”的小石球也说明，当时的狩猎技术和原始狩猎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许家窑人对野马的捕获，为峙峪人以“猎马”为主要生业，由此创造了典型形态的原始马文化奠定了基础。

峙峪人文化遗址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峙峪村附近。峙峪村座落在桑干河发源处黑驼山的东麓，这里是一片波浪起伏的山前剥蚀丘陵带，西、北、南三面被连绵的峻岭所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峙峪遗址即位于峙峪村附近小泉沟与峙峪河交汇处的小丘上。

峙峪人文化尤其具有独特的个性：

一是细小石器工具经峙峪人发展改进，已经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故峙峪遗址被中国考古学界作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小石器系统的典型代表遗址之一，正式命名为“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或称“北京人文化——峙峪人文化”系统。

二是他们制作的“石镞”，最能表现峙峪人文化独具特色的个性，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创造发明。石镞是利用极薄的燧石长石片制作而成，具有锋利的尖端，其一侧经过精细加工，另一侧保持原石片的锋利边缘，石镞底端两侧经过修整使之变窄，其状如同短短的镞程，可以绑在木棍上组合成箭。这表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制作弓箭的技术；弓箭在当时显然用作捕杀猎物，足见峙峪人的狩猎技能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峙峪人发明的弓箭虽然原始，但诚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一种射程远、精确度高、杀伤力强的狩猎工具，既避免了人与野兽对面相搏的辛劳和危险，又大大提高了捕猎效率，因而是当时狩猎技术的一场革命。

三是为数更多的动物化石进一步雄辩地说明，野马、野驴是他们集中捕获的猎物；尤其是野马化石，至少代表 120 个个体（匹），野驴有 80 个个体（匹），说明峙峪人已开始注意观察各类动物的生存状况，更多地掌握了野马等草食动物的生活规律，因而自觉地把狩猎对象朝向专业化发展。

这不但反映出他们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而且，峙峪人也由于使用了射程远、精确度高、杀伤力强的锋利武器弓箭集中猎获野马等动物，后世史家遂称峙峪人为“猎马人”（郭沫若语）；鉴于峙峪人主要生活于黑驼山下峙峪河畔，故我们又称之为“黑驼山下猎马人”或“峙峪河畔猎马人”。

峙峪人制作的石镞，是我国远古人类发明弓箭的历史肇端；峙峪人对野马等动物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与掌握，可以说已经是人类驯化野马，使之成为人类服役的历史先兆了，这就为中国马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峙峪人的原始马文化事实上构成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

峙峪人当年即生活于秦时筑建的马邑古城一带；马邑古城便是中国马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马邑文化便是伴随着中国马文化的历史脚步向前推进的；围绕秦时筑建马邑古城而演绎的关于马的神奇的传说，可以说正是中国马文化历史演进的形象折射。《汉书》、《地理志下》所载“雁门郡·马邑县”条，颜师古曰：“《晋太康地记》云：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为马邑。”这一神奇传说，确是形象地折射出马邑古城在中国马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马邑古城筑建 2000 多年的历史，也已经充分展示了它对于中国马文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

（一）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是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

数千年来迭相崛起的北方各民族，何以无不曾频繁活动于马邑这个历史大舞台；数千年来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一幕幕历史活剧，何以无不在这这里频频登上舞台？追根溯源，首先需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区系以及古代民族集团的构成和他们的分布谈起。

考古学文化区系，或称考古学文化圈，是指我国新石器时代形成的具有区域性分布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中心或系统。

中国原始社会迈入新石器时代，伴随着被称作“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古人类遂即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区的原始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文化面貌渐趋一致，由此形成各具区域性分布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中心或系统，推动着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

在这方面，我国考古学界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在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文化思想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具有全局性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相当准确地把我国境内的新石器文化（含部分青铜文化）划为六个大区”，由此“比较准确地建立起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苏先生亦由此被尊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俞体超：《本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里程碑》，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6页，三联书店，1999年）。

关于六大区系的划分，苏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和《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两部著作中写道：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他解释说：“从词义上看，‘区系’无疑有‘块’、‘片’或‘圈’的意思”：区即“块块”，系即“条条”，“‘块块’指的是按区域划分的系统”，“‘条条’指的是按时代划分的系统”，由此形成“中国考古学的条条块块”。

关于六大区系划分的考古学文化依据，苏先生指出：

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

“渊源”指的是相当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特征”是指各自在新石器中期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区系的考古学文化。“发展道路”指的是相当于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己独具的较高文化特征因素的典型地点。

以上，北方和中原两大区系的划分，是我们提示马邑文化内涵属性的直接考古学文化依据。

与此同时，在我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形成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的民族集团也大体形成了，组合为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所谓“四夷”的五大民族集团，相应地分布于各大古文化区。对此，著名民族史学家翁独健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写道：

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特征看，不仅明确反映出几个文化中心或系统，也某种程度地反映了当时民族集团的情况。在仰韶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夏或华夏民族集团；在大汶口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东夷民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民族集团；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北狄和东北地区的民族集团；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和相互关系中，逐渐形成西戎民族集团。这种事实表明，我国的民族构成和它们的分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大体形成了，也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我们的中华民族不是一源而是多元。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逐渐凝聚在一起的。

就是说，“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古文化区，是华夏（汉）民族繁衍生息的集聚地；而被称作“西戎”、“北狄”（“戎狄”或“胡”）的北方各民族，则广阔分布于“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古文化区，即我国东北、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

这又为我们提示马邑文化的内涵属性提供了直接的民族文化学依据。

以下即就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学层面揭示马邑文化的内涵属性，追溯本节开头所提问题的历史缘由。

按上述六大区系的划分，马邑文化的地理方位显然处于北方和中原两大区系的中间部位，即处于作为北方区系之“重心”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以南和作为中原区系之“中心”的“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以北这样的中间部位；按北方区系的空间界定，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范畴，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

关于六大区系的“北方”区系，苏秉琦先生在他的上述两部著作中对之作了广、狭两义的区别：

广义的北方三大块：西北、北方和东北。狭义的北方则东以辽宁为界……西部以陇山为界，陇西属北方区系，陇东属中原区系。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中国的广大北方可分为三大块：西北、北方和东北。西北与北方的分界线大致在包头与呼和浩特之间；北方与东北的分界当以医巫闾山、辽河为界。

这是说，“广义”的北方泛指我国西北、北方和东北广大地带，习惯上通称“三北”或“大三北”，涵盖了秦岭山脉以北、阿尔泰山以南，西起天山、阿尔金山，中经祁连山、阴山、燕山，东达兴安岭、长白山，以高原、大漠、盆地、森林草原等构成的略呈东西走向的广阔狭长地带。

“狭义”的北方即是排除西北和东北，相当于通常称作“三北”中的北方。其涵盖地域，按苏先生界定：内蒙古中南部之包头与呼和浩特间为“北方”与“西北”的大致分界线；“北方”与“东北”的分界线大致在辽宁西部阜新一带的医巫闾山与辽河间。甘、陕间的陇山属六盘山南段，呈南北走向，为陇西高原与渭河平原的分水岭，所说“陇西属北方区系，陇东属中原区系”，即是“北方”与“中原”大致以陇山东、西间为界；这里的“北方”显系“广义”而言，实为“三北”中的“西北”，故陇山东、西间实为西北与中原之分界。

由此看来，“狭义”的北方区系，大致当是东以辽宁西部之医巫闾山与辽河为界，西以内蒙古中南部之包头与呼和浩特间为界；主要涵盖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冀北）、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晋北）、陕西北部（陕北）这片同样略呈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就其涵盖冀北、晋北、陕北而言，人们又称其为“小三北”。

据此，苏先生所谓“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主要是就“狭义”的北方区系而言；他所谓“狭义的北方”“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这个“中心”，便是前文所述“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这个“中心区域”，指的便是构成北

方区系之“重心”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

那末，就“狭义”的北方区系言，其与中原区系的分界线，也就是它的南沿边界线大致划在哪里？这直接关系马邑文化的区系定位，是揭示马邑文化内涵属性的最直接的考古学文化依据。

对此，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曾专门就“晋文化”考古又一次谈到北方区系的空间界域及其与中原区系的分界线，也就是它的南沿边界线大致划在哪里的问题。他特地“把‘晋文化’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提了出来，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新事”，“是创举，是大事，应当慎重从事”。因此，“作为考古学命题，‘晋文化’应该有它的界定范围。”基于此，他以“作为北方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为题谈及北方区系的空间界域。指出：

“北方古文化”一词，这里专指和山西北部古文化密切联接的地区。从考古学文化区系角度加以重视并给以界定的认识，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几年间的事情。它的界定范围大致是：西以包头市——东胜（不清晰界线），南以太原——榆次地区（不清晰界线），东以张家口（地区）——锡林郭勒（盟）（不清晰界线）为限，大体与习惯上称作“三北”中的“北方”相当（包括内蒙古中南部一部分、晋北、陕北和冀西北一部分）。

苏先生这里关于“北方古文化”的界定范围，如他所说，是“专指和山西北部古文化密切联接的地区”，也就是北方区系的南沿地区。

那末，北方区系的南沿边界线，也就是它与中原区系的分界线大致划在哪里？苏先生说，按这个界定范围，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曾经对“晋中地区以太谷白燕遗址为基地和附近几个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并“在晋中地区调查到的大量遗址中选择发掘了太谷白燕遗址”，“依据太谷白燕遗址发掘成果，已经明确了晋中地区已是北方区系的边缘”，“明确分辨出”“晋中太原一带是它的南界”，“证明晋中太原盆地是正北方文化区系的南部前沿”。

这就是说，以太谷白燕遗址为标界的晋中太原盆地的考古学文化，已经“明确分辨出”属于北方古文化范畴，明确了这一带“已是北方区系的边缘”，它的“南部前沿”，它的“南界”，北方区系的南沿边界线，也就是北方、中原区系的分界即大致划在这里。

以上所述向我们表明：

其一，所说“山西北部古文化”，即是指由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和晋中太原盆地等三大盆地为主体构成的今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古文化；

其二，山西中北部属北方区系空间界域，山西中北部古文化属北方古文化范畴；

其三，相对于北方区系的“重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或“中心”——“辽西

和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古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

其四，马邑地处大同盆地西南端之桑干河源头黑驼山、洪涛山一带，自然属于北方区系空间界域，属于北方区系南部前沿，马邑文化自然属于北方古文化范畴，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

这便是就考古学文化层面揭示马邑文化内涵属性的基本理论推断。

那末，就民族文化学层面考察，就是说，按古代民族集团的构成和它们的分布，被称作“西戎”、“北狄”（“戎狄”或“胡”）的北方各民族，广泛分布于涵盖我国西北、北方和东北的“广义”的北方区系。

苏秉琦先生谈六大区系划分的考古学文化依据“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主要体现为“自身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区系的考古学文化”和“具有明显的自己独具的较高文化特征因素的典型地点”，也就是自身独具的“文化特征”和“发展道路”，这主要则是由构成各该区系的“重心”、“中心”或“中心区域”集中体现出来的；就“狭义”的北方区系言，便集中体现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这个“中心区域”所属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一带的红山文化和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的大青山下河套文化及其相应的考古“典型地点”。这便是“狭义”的北方得以作为一大独立区系的考古学文化依据。

从民族文化学层面考察，处于“中心区域”的红山文化、河套文化等考古“典型地点”，自然也就是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集聚地，是他们的策源地，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带；他们创造的古文化，集中体现了“狭义”北方区系所独具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

那末，处于北方区系南部前沿的马邑，自然属于北方民族活动的地带，属于他们活动的南沿地带，主要是他们迭相南下与中原民族频繁交往的直接通道或口岸地带；作为北方古文化南部前沿文化的马邑文化，自然属于北方民族文化有机构成要素，主要是在北方民族文化同中原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表现出兼容不同民族文化的宽厚博大性格。

由此看来，本节开头的问题，便不难从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学层面探溯其旷古久远的历史缘由了。

（二）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汉）民族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

马邑文化作为北方古文化南部前沿文化，自身即蕴涵了与中原古文化交汇过渡型属性。

就是说，马邑文化所处北方区系南部前沿地带，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即是中原区系北部前沿地带，实际上属于北方、中原两大区系间参互错杂地带，其文化必然呈现北方、中原两类古文化交汇过渡态势；因此，就考古学文化层面考察，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

这又需谈及中原区系的空间界域。

对此，苏秉琦先生又曾以“作为中原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为题特地谈及“中原古文化”“这个考古学文化区系概念的形成”。按他的说法：“它是对近若干年来西起甘（肃）青（海），东至山东一线考古工作成果进行总结得出的一种‘暂设’的认识”。基于这一认识，他作出了关于“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的划分，并指出，中原区系的空间界域涵盖了“大致西起甘肃东部，东至河南中部的郑州，中间穿过陕西关中（渭河盆地）”这片呈东西走向地带。

其西界：即“陕西、甘肃两省间隔着六盘山和陇山这样一条不清晰（模糊）的界限（文化的）”，“陇西属北方区系，陇东属中原区系”，这是中原与北方区系的大致分界线。

其东界：即“豫东（郑州以东）、鲁西（大运河以西）间也存在一条不清晰（模糊）的界限（文化的）”，“中原区系与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之间的界限要在这里寻找”。

可见，中原区系主要涵盖西至陕西宝鸡，东至河南郑州间这片地带，同时“也包括隔黄河对应的晋西南、晋中（按当为“晋南中段”）和晋东南地区”。

进而，苏先生再把中原区系划分为三个支区系、“其一，可暂称西支，约在宝鸡——陕县间”；“其二，可暂称东支，约在洛阳——郑州间”；其三，“位于上述东、西两支（区系）之间的洛阳——陕县一段”，自然可暂称“中支”了。

于是，他在就“晋文化”考古而谈及中原区系时，又以“作为中原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为题，分析了“属于‘中原古文化’一部分的晋南地区古文化”，也把晋南地区古文化划分为与上述三个支区相对的三个分区：“第一分区——晋西南，恰与陕西华县——河南陕县地区对应”；“第二分区——晋南中段，以同澠池县隔河对应”；“第三分区——晋

东南（长治、晋城地区），同邻省河南的洛阳——郑州相联接”。

按上述中原区系的空间界域，由陕西宝鸡——河南洛阳及隔河对应的晋南地区构成的“关中、晋南和豫西”一带，正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其中陕县——洛阳间则是仰韶文化发源地——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所在，“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化因素，在中心地区经过了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这些，便是中原区系“明显区别于其他区系的考古学文化”以及“明显的自己独具的较高文化特征因素的典型地点”，它集中体现了中原区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展道路”；这些，正是中原得以成为一大独立区系的考古学文化依据，也正是关中、晋南、豫西得以成为中原区系之“中心”的考古学文化依据。

以上，苏先生关于晋南地区古文化的界定范围及其“三个分区”的划分向我们表明：

其一，晋南地区古文化的空间界域，涵盖了以临汾盆地、运城盆地、长治盆地（上党盆地）为主体，由今临汾市、运城市、长治市、晋城市构成的整个山西南部地区。

其二，晋南地区古文化属于中原古文化区系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原古文化的内涵属性。

其三，拿苏秉琦先生的话说：“正如晋中是北方文化区的南沿一样，晋南是中原文化区的北沿。”这里的“晋中”其实泛指山西中北部地区。因为，晋中所处汾河中游西岸太原盆地（晋中盆地）与滹沱河上游西岸忻定盆地和桑干河上游西岸大同盆地构成为整体文化地理单元，统称山西中北部文化区或晋北文化区；与之相对应的即为山西南部文化区或晋南文化区，它是由汾河下游两岸临汾盆地、涑水流域运城盆地和沁河、漳河流域长治盆地（上党盆地）构成的又一整体文化地理单元。从而就是说，如同山西中北部处于北方区系的南部前沿文化一样，山西南部即处于中原区系的北部前沿；或者说，如同山西中北部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一样，山西南部文化即属于中原古文化的北部前沿文化；总之就是说，山西中北部和山西南部共同处于北方、中原两大区系间参互错杂部位。这种参互错杂，也正是苏先生讲的“各大区系之间还会存在一些区系间文化交汇的联结带”那种情形，就山西南部文化讲，如“当年晋国的政治中心范围恰恰处于北方与中原两大考古区系中间的联结点”；这种所谓“联结带”或“联结点”的情形表明，山西中北部文化和山西南部文化同属边缘型文化，亦即北方与中原两大考古学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

因此，就考古学文化层面考察，作为山西中北部文化有机构成的马邑文化，自然属于交汇过渡型文化了。

那么，就民族文化学层面考察，就是说，古代山西地区历来是北方戎狄（胡）民族同中原华夏（汉）民族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枢纽，山西地区文化便是北方与中原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产物。分别来看：山西中北部主要是北方各民族分布活动区，其文化属于北方民

族文化系列；山西南部则主要是中原民族分布活动区，其文化属于中原民族文化系列。但总体说来，山西地区文化是在北方和中原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总体上属于交汇过渡型文化。

马邑处于山西中北部文化区的中间部位，历来是北方各民族迭相南下同中原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和口岸，马邑文化便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历程中形成的交汇过渡型文化。

由此看来，本节开头的问题，也便不难从考古学文化与民族文化学层面探溯其旷古悠久的历史渊源了。